

從「學以為己」到「事事關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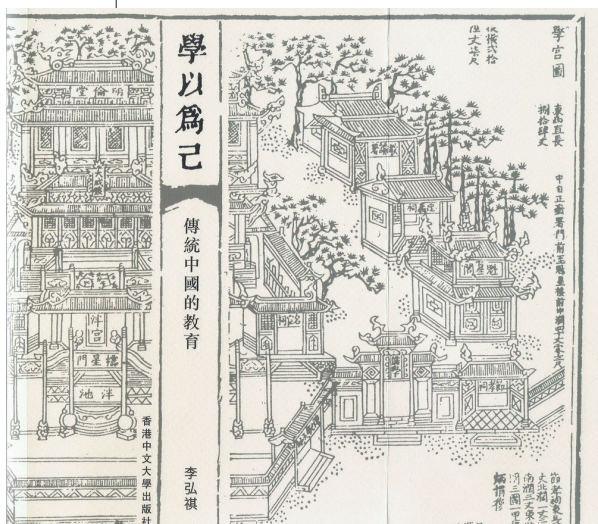
文・圖／李弘祺

公元2000年，我用英文出版了中國傳統教育史的書，題為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大約有700多頁。這本英文書是大膽之作，所幸各方書評倒還都很正面，到現在已經被引用超過100次（根據Google Scholar），以英文不是母語的人所寫的書來說，我應該感到滿足了。

兩年前我把這本書翻譯為中文，加以修訂，並把書名定為《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明確地用4個字來標示傳統中國教育的最大特色。我在書中加了一篇〈傳統中國教育的特色與反省〉。這篇文章是我在2011年「北京論壇」上發表的論文，後來登在《北京大學教育評論》期刊。說特色，不如說是課題或關心。無論如何，我提出了7點：養士教育與科舉，為己之學與書院的理想與實踐，以儒家經典為中心，在庶民教育中灌輸儒家正統（三綱五常等）的價值，個別施教與不分年齡班次，重視文字考試及忽略口頭論辯，以及儒家權威人格。

中國教育傳統固然是以所謂的「養士」為目標，但若以其信念言之，那當然是以道德的培養作為根本；認為君子是健全社會的中堅，而唯有受到健全道德教育的君子才能領導社會。君子教育的內容不外是學習儒家的經典，所以越到後代，儒家典籍的影響越大，特別是推行科舉考試以後，「讀書人」最大的責任就是訓練自己成為老百姓（庶人）的道德表率。政治及社會的領導者基本上都是熟讀儒家經典的君子，這樣天下就得以安定、一切都上軌道。這個教育當然反映了孔子的「學以為己」，以它作為最合適的標誌和理想。

「學以為己」出於《論語》，之後經過荀子、揚雄等人提倡，成了一個重要的讀書理想；到了宋代的朱熹，更被標榜為讀書人的根本態度。從此，很多人引述這句話。因此「學以為己」的確可以說是歷代中國人讀書的基本動力和追求的最終理想。這並不是說接受教育沒有別的動機，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讀書人，都相信教育不外是道德的培養和薰陶——使自己能取得道德的完美是讀書的目的，也是日後帶領社會（國家）的角色的根基。



我的中國傳統教育史英文著作，翻成中文書名《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重新出版。



朱熹標榜讀書人應「學以為己」。

從宋代以降，科舉考試逐漸變成讀書人讀書的目的，但是儒家經典的道德向度却也同時繼續高漲。明朝中葉，道問學的思想已經被尊德性的思想解構，使前者徹底轉化成道德行為的憑借，是人心之理（心即理）「塑造」萬事萬物，使它們各自完成其「德」的方法。所以說明末東林思想家開始反省陽明心學（特別是它的左派）的平等（齊頭）主義以及空洞的自信時，仍然持續了「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論述，並繼續用「大丈夫」豪傑氣度和道德上的自我期許深化對萬事萬物的關心。

顧憲成的名言因此必須放在這個脈絡裏來瞭解：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事事關心」這4個字原來是指心為外界的美麗事物而感動，常用於詩詞，但是顧憲成拿它來指對天下國家事務的關心。從「道問學」的原本意義來看，它的道德義就不再只是專指個人的品德，而更廣泛地引申為天下一切的事務。東林運動與明末一些思想家對「牧童樵夫」宣道的行為是一體的兩面，充分發揚所謂「道不遠人」（就是王艮說的「百姓日用」）的說法。

事實上，朱元璋曾經在太學立臥碑，禁止太學生干政。這個臥碑還在全國的地方學校普遍樹立，等於是百姓（包括讀書人）不許「事事關心」，這是何等的矛盾，又是何等的諷刺！但明末是一個非常的時代，它的矛盾或許可以說是表現在徽州與無錫的兩種價值取向上面（就好像社會學家喜歡說的波士頓與費城的對比一樣），表現當時走向資本經濟萌芽、思想追求解放的現象。再加上西方宗教開始傳入中國，的確有一番的熱鬧。

近代中國教育突破政府的禁令，開始有機會摸索、探新、並與新思想開始試驗新格義的是17、18世紀，允為中國近代教育史的開始，這一點我想應當是可以接受的。從此，中國的教育就從「學以為己」轉入「事事關心」了。

在中國，史學界一般認為鴉片戰爭才是近代的開始。這個說法固然不錯，但是它的思想基礎仍不外是「尊德性」改造了「道問學」的意涵而開始的「事事關心」。



宋代殿試圖。（取自Wikimedia commons, almost all content hosted on Wikimedia Commons may be freely reused. 參見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Commons:Reusing_content_outside_Wikimedia，出處：<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alastexamen-SongDynastie.jpg?uselang=zh-tw#file>）



東林書院，轉載自＜無錫-蘇州-上海流水帳＞
（<http://zengrong.net/post/1034.htm>）



顧憲成（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Gu_Xiancheng.jpg）



王艮（<http://www.qstheory.cn/wz/lis/201302/W020130220381689578310.jpg>）

李弘祺 專欄。



王良講學 (<http://www.tznews.cn/2013/news/redian/2013/04/2013-04-06271298.html>)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切的事務都受到了挑戰。在教育的範疇裏，雖然科舉仍以熟讀經典為必經之路，但是新的思想、新的知識和新的技術都與傳統中國一共才50多萬字的經典競爭（現在內容最豐富的《牛津大英字典》就收羅超過一百萬不同的字或詞。《康熙字典》收了4.7萬多字；當代的《漢語大詞典》收有2.2萬多字，37.5萬複詞），顯然舊知識再無法以科舉來維護它的權威。教育的內容迅速擴大，而舊的教育制度也不能不隨社會的改變脫胎換骨。

舊的「讀書人」也漸漸被新的「知識分子」所取代，雖然「知識分子」的用法不是很好，掩蓋了它獨立及個人主義的意涵，不過受教育的人不再只是「讀聖賢書…」的酸腐秀才，而是必須同時對道德及知識都有涉獵的現代世界公民。教育的內容或課程改變了，新的學校也因為西方勢力在中國的興起而迅速取代舊的書院或社學。從1840到2000年的60年間，中國「學生」的定義逐漸改變，最後傳統的書院和科舉都在20世紀的第一個10年間，從地表消失。

近代中國的教育思想和實踐在蔡元培、胡適、梁漱溟、蔣夢麟、陶行知、晏陽初



蔡元培 (http://www.suiis.com/img/info/info_20131026-1.jpg)



蔣夢麟（最右邊）與胡適（中）
(<http://www.xzmsw.com/upload/13032616141398.jpg>)

等人的影響下，不論是開放、保守、新組織、或新制度，大概都不外想要改造及重估原來的參數（parameter）——原來已經有的，必須保持其優點，並求其更好，或徹底加以改造；原來沒有的，就研求設立新制，引進其他文明的經驗。整個中國的教育在20世紀經歷的是翻天覆地的變動，從文字的改革及新蒙書的內容就可窺見一二。另外，從掃盲運動、農村改造等民間自發的志願工作，也可以看到現代知識人對「事事關心」這個信念在行動上面的想象。

在這種變化當中，最重要的不外是對傳統中國政府控制學生及思想的反動。從五四（1919）到當前香港的佔中，學運活動充分體現了近代流行的民主思想對中國的影響。雖然不管是民國或共和國，政府都是反對學生運動的，共和國甚至於想要駕馭學生的熱情來遂行政治鬥爭（這是一般對文化大革命的解釋），但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近代學生運動終究會使中國的政治家們對所謂的民主制度及觀念有更更新的、更宏觀的認識和體會。無論如何，從前不許學生關心的朝廷大政已經不再是現代政治家的禁嚮，這就是從帶知識性意味的「道問學」轉化為道德上的事事關心，到近代中國被動的徹底參與的過程。

最後，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從前用儒家道德正統的教誨，透過講會、祭祀、演劇及民間宗教活動的方式來達成的庶民教育，在新的中國則由現代世界平等觀念來改變它的形式。新的教育體制與從前書院或官學的不同就在於它已經脫去限定於少數優秀分子的外殼，而穿上了所謂「女子負起半邊天」，「階級鬥爭」等口號的新大衣，推動了所有人都必須在民主專制的大旗下受共產思想的教育。在傳統中國，政府的控制大概僅到達縣的層面，但是在共和國的社會裏，政府的力量已經徹底在鄉村的社會裏出入、翻滾。這就是新的中國社會教育。不過，這當然也開創了機會，讓許多從前不可能讀書的窮弟子能遠離家鄉，到城市去上大學，參加中國從改革開放以後的「有中國特色的近代化」活動。

從明末到今天，「事事關心」因此同時是一種理想、一項憧憬，而同時也是一個不可逃避的現實。因此，它無疑的是近代中國教育的最佳寫照。[圖]

附記：

我在《校友雙月刊》寫專欄不覺已經兩年。我非常謝謝執行主編林秀美女士的鼓勵和支持。今年，我從清華大學退休了。雖然我還會常常回來臺灣，但是此去的活動還不确定，因此我對林女士說，以後我就不按時每兩個月交一篇稿，改為不定期。希望這樣可以保持我文章的水準。好幾次不相識的校友給我寫信，我一併在這裡向他們道謝。（2014年6月15日，進臺大讀書第50年，從耶魯大學畢業出去教書第40年。）



李弘祺小檔案

歷史系畢業（1968），當完兵後就到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並於1974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991年，轉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任教，於該校榮退。2007年回到臺灣，在交通大學負責通識教育的工作，並出任該校的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同時也創立該校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心。2011年起應聘到清華大學擔任講座教授。

李教授長年研究傳統中國教育史，著有《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及《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兩書都同時有中、英文版），以及其他中英文著作，內容涵蓋中西文明之交流與比較，史學之本質與目的等課題，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李教授曾多次回國在本校擔任客座教授及講座教授等職，也是東亞文明中心的首任主任。在香港及紐約時熱心參加校友會的活動，1992年後曾任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理事多年。